

华夏文明传播
研究文库⑨

主编◎谢清果 钟海连

光荣与梦想： 传播学中国化研究四十年 (1978—2018)

谢清果 等◎著



Guangrong yu Mengxiang
Chuanboxue Zhongguohua Yanjiu
Sishinian
1978-2018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华夏文明传播
研究文库⑨

光荣与梦想：

传播学中国化研究四十年

(1978—2018)

谢清果 等◎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荣与梦想：传播学中国化研究四十年：1978—
2018 / 谢清果等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 12
ISBN 978-7-5108-7593-9

I. ①光… II. ①谢… III. ①传播学—研究—中国—
1978-2018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8630号

光荣与梦想：传播学中国化研究四十年（1978—2018）

作 者	谢清果 等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2.7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593-9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一、文明传播：文明的传播与传播的文明

“文明传播”概念的提出与理论阐释已经成为中国传播学界一个别样的探索方向。从“文明传播”的视角来审视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以及背后的传播机制是人类自我反省的必然要求，而文明传播研究的成果从根本上具有指导人类文明航向的意义。

“文明传播”问题的提出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几位传播学研究者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央电视台首都新闻共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文明工程”运动。得益于“文明工程”运动实施引发了“文明传播”问题的思考，并于 2006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文明论坛”上提出建构“文明传播学”的观点。2007 年 8 月“文明传播的跨学科研究与学科创建”课题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资助重点课题获得立项，主要参与者有季燕京、毛峰、王怡红、杨瑞明、张丹、胡河宁、胡翼青、刘明等人。季燕京、毛峰于 2007 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以文明传播思想为核心的传播哲学》一文，文章认为：“以文明传播思想为核心的传播哲学认为，信息传播最深刻的起源应当在人类的社会实践——认识结构之中，其最核心的基础和根本问题是社会认识的主体性起源。同时，任何社会认识的主体性都应当是基于社会实践主体性之上的。也就是说，社会实践中的各种利益关系、组织方式以及不同主体所处的社会历史地位，这是社会认识中主客体关系的基础或依据。因此，真正了解社会传播的主客体关系及其主体性问题，包括起源和形成，都应当从社会的利益关系、组织关系、物质条件以及相应的认知模式中寻求答案。”总而言之，文明传播追求的是自觉审视社会整合中通过社会组织方式而实现的利益交换整合和通过社会

传播结构而实现的信息交换的整合，从而形成与当代和谐社会理念相配合的传播文明视域。毛峰则是较早关注文明传播且富有成就的学者，他从研究《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入手，提示出伊尼斯的文明传播观：“文明在确立、生长、扩张与绵延的过程中会不断遭遇传播问题：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是否合理流动分配、文化价值是否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共信，是这一文明能否实现内部整合的基础；而在外部扩张上，文明对自然的开发是否超过自然所能忍受并自我修复的限度、文明是否能合理对待其他文明中的社区与人群，更成为文明生死存亡的关键。文明在传播过程中时常出现的‘偏向’与失衡，往往置文明于死地。文明传播的悖论在于：文明在物质、技术以及媒介层面的进步，常常打乱了固有的文明传播秩序，尤其是文化信息的骤然增加与分歧杂乱，使原本共享共信的文明价值被怀疑并否弃，最终使文明成为传播的牺牲品，文明由于传播的偏向而堕入战乱、崩溃等非文明的野蛮状态。”^① 如此看来，文明传播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在于自觉维护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促进和保障人类生活和谐。毛峰从中国的《论语》中找到防止文明传播异化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孔子提出的救济传播的偏向、失衡与异化的原则是对文明传播活动施以道德指引，使文明传播活动回归其逐渐偏离的自然秩序（道）与社会秩序（德），赋予文明传播牢不可破的道德基础，使文明永葆活力、持久与和谐。”^②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的智慧蕴藏着丰富的文明传播理念。毛峰认为“文明传播的法则是自然生态与人类活动的良性平衡”，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养成中国的“文明模式”：“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辅以道家等先秦思想而形成的中国世界观，确保了中华文明在绵延五千年的悠久岁月中取得独步世界的辉煌成就，其尊崇爱护自然、力行道德教化、追求精神提升、万物和谐的文明模式，在世界其他文明盛衰不定的历史急流中，保障了中华民族的长期统一、稳定、繁荣、与他民族和谐共存等高度可持续性。”^③

2012年11月，《文明传播的哲学视野》一书作为“文明传播的跨学科研究与学科创建”的结项成果正式出版，“文明传播”理论得以完整呈现。该书分“关于文明传播的基本认识”“传播学的反思与中国学派的传播哲学”“中

① 毛峰：《文明传播的偏向与当代文明的危机——伊尼斯传播哲学中的历史智慧》，《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毛峰：《回归道德主义：孔子文明传播思想论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③ 毛峰：《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前言第4页。

华文明传播的原理探索”“中华商业文明及其传播机制的历史反思”“文明的转型与发展传播理论的反思”“文明跃迁进程中的组织变革与战略理性”六篇共三十四章。该书的问题意识在于“中华文明何以传播承续至今而不中断”“现代传播学为什么不能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重大和基础性问题”“文明转型过程中涉及什么样的传播思想、传播结构、重大社会理论和组织方式问题”而“文明传播”概念的基础内涵在于人类在克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重重矛盾的努力中所达到的历史进度和高度。显然，“文明传播”的目标是和谐，实现和谐传播的方法和途径是对话和反思。其中，“文明传播”作为概念，是“文明的传播”与“传播的文明”的统一。前者强调的是“文明”在传播中生成和发展；后者强调“传播”亦是在“文明”的观照下进行的，传播活动本身也进行着“文明”的洗礼。正所谓“文明通过传播，走向对话语境，达到和谐。传播是表明文明的手段，是显露文明的平台，传播的对话方式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①

二、华夏文明传播：华夏传播学的理论特质

“华夏传播”的提法，最早出现在《华夏传播论》一书中。然而书中却未对这一概念做说明。《华夏传播论》最初拟名“中国古代文化传播概论”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最后正式出版时改为现名。可见，当时“华夏传播”仅作为书名的缩写形式出现，还没有鲜明的概念意识。真正将其作为概念提出的是黄星民教授，他发表《华夏传播研究刍议》一文，清晰地勾勒出“华夏传播”一词使用的脉络，进而分析“华夏”一词的文化意涵——华夏特指古代中国，且内含地理中国和文化中国的褒义。他这样界定“华夏传播研究”：“华夏传播研究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这个定义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该研究的范围，即大抵指涉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社会。其二，指出“传播活动与传播观念”是该研究的对象。“传播活动”包括传播媒介、传播人物、传播事件、传播制度等以及它们的沿革流变、经验教训和基本规律；“传播观念”指的是关于传播的言论、观点，学说、思想，甚至传播哲学等等。重点

^① 杨瑞明，张丹，季燕京，毛峰主编：《文明传播的哲学视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在华夏传播思想与传播制度。其三，指出“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是该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发掘、整理”是研究者对华夏传播活动进行客观的描述，是基础。“研究、扬弃”是研究者在发掘、整理的基础上，运用传播学等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加以验证或阐释，力争从其中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把它们提炼成科学的传播理论，用来指导今天的传播实践，丰富和发展世界传播学理论。“研究、扬弃”也可以从批判角度入手，告诫我们如何去避免过去的失误。这样的“华夏传播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就十分明显了：学术意义，即熔西方传播科学理论和华夏传播学说精华于一炉，共同解释、指导和总结今天中国的传播实践，形成我国特色的理论范式，形成传播学中国学派；发扬时代色彩，华夏传播研究在华夏文化与信息传播两方面保持着灵动的张力，如此既有助于发扬中华文化的魅力，又有助于培育、探索适合中国国情，能够阐释中国实践的信息传播学说；提供世界启示，华夏技术与传播道德的结合，是中华文明延续的内在原理，这对于世界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启迪意义。^①

“华夏传播研究”作为领域已然形成，正像传播学可分为经济传播学等方向，华夏传播研讨华夏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活动与现象，自然也可以称之为“华夏传播学”。当然，“学”通常被解读为“学说”“理论”，亦有“学科”之意。笔者认为，“华夏传播学”的前提假设是承载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文化虽然没有用现代传播学话语表达传播学理论，但是已然存在直接或间接用中国话语（无论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表达的传播学理论却是存在无疑的。如《鬼谷子》的论辩说服理论和张仪、苏秦的说服实践，《韩非子》中的《说难》篇、《吕氏春秋》中的《察传》篇对口语传播的理论提炼，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当然，这不是“西学中源”的自吹自擂，而是强调立足中华传统，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生活生产实践，延续、传承、创新我们中国传播理论，借助西方的传播学说和方法，重塑可与西方对话，阐释中国实践的华夏传播学。因此，华夏传播学是华夏传播研究的终极指向。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华夏传播学是在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能够阐释和推进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传播机制、机理和思想方法的学说。”这里包含三个含义：其一，以史鉴今，通过开展华夏传播研究，提炼华夏独特的传播理念、传播技艺；其二，华夏传播研究的目标在

^① 黄星民：《华夏传播研究刍议》，《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于既能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传播现象与活动，又能推导中国当代社会实践，实现传播理论的当代创新；其三，着力点在于将复杂的传播现象、传播制度、传播理念通过“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形成一套能够保持自然生态和谐、社会关系和顺、政治运作高效廉洁、民众生活有序安宁、国际关系和平互助的传播思想与传播制度，以指导当下的传播活动，实现与社会组织方式的紧密配合。换句话说，既保证了社会制度安排必需的公平正义，又在合理的传播秩序中保障权力运作过程的公平正义。用今天的话来说，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需要作为社会公器的传播媒介确切发挥功能，不沦为只当政府的耳目喉舌，而首先充当公民的耳目喉舌。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传播制度、传播理念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甚至有时显得有些反动，但从理论上讲，这是实然与应然的矛盾。拿古代士人传承的传播观念来说，其中就有如史家的秉笔直书传统，但在制度化传播管理控制时，产生了偏差，出现了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情景，再等而下之，具体的传播活动和事件上往往是沦为人治，而不是注重法治。华夏传播学的起点在于客观地把握中国传统社会中传播实际（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归宿点则在于拨乱反正，将先贤对实现大同世界的诸多构想和探索，经过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以中华传统价值观为内核综合创新成适应社会主义实践的传播观念、传播制度和传播活动。这样的学说，才是“秀外慧中”的。

周伟业将华夏传播理论称为东方范式，他以汉语成语、谚语、俗语为例，认为华夏传播理论蕴含着行胜于言的传播取向、一诺千金的传播伦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语言理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舆论警示，表现出以人际传播为核心、既重视语言又怀疑语言、聚合中华文化基因等特征。相对于欧美传播理论，华夏传播理论在文化根源、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上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

1. 文化根源

华夏传播学体现以儒家的中庸太和、道家的无为自然和禅宗的缘起性空为核心精神的华夏文化，而经验学派源于实用主义哲学，讲究通过媒介控制，达到社会行为调控的效果；批判学派源于法兰克福学派，侧重于对社会、文化、传播现状的反思和批判。

2. 价值取向

华夏传播学的主旋律是和谐，力求通过传播活动构建内心和谐、人际和睦、天人合一的和谐人生、和谐社会、和谐宇宙。经验学派的价值取向改良社会，关注的是如何和多大程度上调整传播活动以改善当前的社会统治。批判学派价值在于变革社会，着力点在于反思传播过程中的控制合法和合理问题，进而促进传播控制的合法合理。可见，“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总体取向是通过媒介生态的改造来改良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华夏传播理论的总体取向是通过人际关系的协调来实现社会关系的优化”。^①

3. 思维方法

华夏传播学以“中庸”（或称为中和、中道）为核心的思维方法是对历史与现实生活智慧不断进行理论提升的结晶，因此，其运思过程就是生活智慧的不断积淀和升华，是经验思维（实用理性）取向。经验学派则讲究科学实证，要求运用问卷调查，社会实验等方式来进行数据分析，因此是科学思维取向。批判学派则是理论反思与现实批判，注重通过人文精神的重塑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因此是批判思维取向。

表达方式和适用范围。华夏传播学的表达方式往往是经验性的话语，如格言警句、成语，适用广泛，不仅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现代，这体现出华夏传播学较擅长解释人际传播现象。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表述方式是学术话语，以概念和理论的形式出现，更适用于大众传播时代，因此能较好地解释现代社会的媒介传播、组织传播。

总而言之，华夏传播学“是一种历史沉淀、文化积累。它不同于为政府、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的实证研究，也不同于批判现代社会弊病、文化工业问题的理论研究，是一种扎根于中华文化的东方范式的传播学理论。它是汉语文化对人类传播规律的深刻领悟，也是华夏文明对世界传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②

综上所述，华夏传播学贯通古今，以传统为主，以现实为辅；以现实为导向，以传统为着力点；试图在对华夏传播史与华夏传播理论的双重观照中，寻找传统与现实的逻辑起点，围绕社会运作与信息传播的互动为主线，夯实

^① 周伟业：《东方范式：华夏传播理论的内涵、特征与价值——以汉语成语、谚语、俗语为中心的思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② 周伟业：《东方范式：华夏传播理论的内涵、特征与价值——以汉语成语、谚语、俗语为中心的思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中华民族圆“中国梦”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华夏文明传播”观念,不仅仅是将文明传播的视野集中于中国,而且是要聚焦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即华夏文明),着力挖掘华夏文明中的传播智慧,当然也追求依托华夏文明来与西方传播实践与理论展开对话,鲜明地传播中国好声音,讲好中国好故事,用我们的中庸、天下、和谐、礼乐等观念来阐述华夏传播理论,来解释中国当代社会交往与国际传播背后的理念,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构起自己的传播话语体系,让世界理解华夏文明是以追求“天下太平”为己任,她奉行“和而不同”的交流观念,具有极大包容性、开放性和开拓性的优秀品质,世界的和平发展需要华夏文明贡献智慧,华夏文明也乐于与世界分享中国智慧。

《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文库》将以研究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一方面注重传播华夏文明,从多个维度研究中华文化传统,以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使华夏文明能够薪火相传;另一方面积极阐扬华夏文明的传播智慧,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以他者为镜鉴,建构华夏文明传播的思想体系,提供可以与西方传播理论对话的中国文本。

主编 谢清果 钟海连

2016年2月26日

代序 本土之路三十年

邵培仁 姚锦云

一、从“零”到“一”：华夏传播研究三十年

华夏传播研究起初被称作“从零开始”（余也鲁，郑学檬，1994），^①如今或许已“从零到一”（吴予敏，2018），^②逐渐走向成熟。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华夏传播”的正式提法最早见于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1997）。此后是郑学檬主编的《华夏传播研究丛书》（2001）和赵晶晶（J.Z. 爱门森）编译的《当前国际论坛中的华夏传播理念》（2010），近年又有谢清果《华夏传播学引论》（2017）和潘祥辉《华夏传播新探》（2018）等著作出版。^③“华夏传播”在论文中的早期提法见于陈世敏的《华夏传播学方法论初探》（2002）和黄星民的《华夏传播研究刍议》（2002），近期有周伟业的《华夏传播理论的内涵、特征与价值》（2010），谢清果《华夏传播学勃兴的东方视维、问题意识与方法自觉》（2014），邵培仁、姚锦云《华夏传播十大观念》（2016），邵培仁、姚锦云《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逻辑》（2016），谢清果《2011-2016：

① 余也鲁，郑学檬主编：《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吴予敏：《从“零”到一：中国传播思想史书写的回顾和展望》，《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期，第90—108页。

③ 参见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美]赵晶晶（J.Z. 爱门森）编译：《“和实生物”——当前国际论坛中的华夏传播理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谢清果：《华夏传播学引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潘祥辉：《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华夏传播研究的使命、进展及其展望》(2017)等。^①2013年,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创办了学术期刊《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谢清果主编),其发刊词便以《责无旁贷地推进华夏传播研究》为题,并刊登了三篇纪念余也鲁的文章:《余也鲁与厦门大学的华夏传播研究》(编辑部);孙旭培《行进在华夏传播研究的路上——记我与余也鲁教授的相识相交》;陈培爱《记华夏传播研究的奠基人——余也鲁教授》。该刊还初步统计了《华夏传播研究文献编目》,发现以传统文化为取向的传播研究专著已不下120种。^②2018年,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又创办了《华夏传播研究》(谢清果主编),并筹划成立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华夏传播研究会”。

华夏传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既与传播学“本土化”密切相关,又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取向。黄星民这样定义“华夏传播研究”:“华夏”最早是汉族先民的自称,后来用它来指称中国,今天则专指古代中国,因而“华夏传播研究”的范围应该限定在古代中国;“华夏传播研究”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③依照此定义,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1988)被称为“第一本华夏传播研究专著”。^④而作为华夏传播研究的第一部集体成果,则是由余也鲁、郑学檬主编的《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1994)。余也鲁说:“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让中国文化里头潜藏的一面,可以在大家的努力耕耘下,得到发扬。”^⑤陈培爱认为,余也鲁先生是“华夏传播研究的奠基人”:早在1978年,余也鲁就提出“中国的传学可以回溯到数千年”,例如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的说服术,郑和下西洋的传播技巧等;1982年4月,余也鲁陪同施拉姆来到中

① 参见陈世敏:《华夏传播学方法论初探》,《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1期;黄星民:《华夏传播研究刍议》,《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周伟业:《东方范式:华夏传播理论的内涵、特征与价值——以汉语成语、谚语、俗语为中心的思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谢清果:《华夏传播学勃兴的东方视维、问题意识与方法自觉》,《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2期;邵培仁、姚锦云:《传播理论的胚胎:华夏传播十大观念》,《浙江学刊》,2016年第1期;邵培仁、姚锦云:《为历史辩护: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逻辑》,《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3期;谢清果:《2011-2016:华夏传播研究的使命、进展及其展望》,《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期。

② 参见谢清果:《华夏传播研究文献编目(一)》,《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期。

③ 黄星民:《华夏传播研究刍议》,《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04期,第80—86页。

④ 黄星民:《华夏传播研究刍议》,《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⑤ 余也鲁:《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代序)》,[美]W.宣伟伯:《传媒、信息与人》,余也鲁译述.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国,实现了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破冰之旅”,他在复旦大学做报告时首次提出了“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认为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一定可以找出不少亮光,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人类的“传”的行为。^①这当然可与施拉姆的观点互通:“我们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与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了解自己的工艺智识,增进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该是多末好的事。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的学问上的认识的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长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②

孙旭培组织编写面向中国古代的《华夏传播论》,就是因为受到了施拉姆此言的感染和鼓舞。他在1993年厦门大学举办研讨会期间,向余也鲁提出了编写设想,“广泛论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传的现象”,并得到了对方的欣然赞成。^③尽管孙旭培在《华夏传播论〈序言〉》中提出:“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间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④但从《华夏传播论》的内容构成来看,“华夏传播”实际上是传统文化取向的:其副标题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全书二十五章内容几乎都面向中国古代。此后,厦门大学也组织编写了一套《华夏传播研究丛书》(郑学檬主编,2001)。郑学檬提出:“‘传播研究中国化’离不开三个基础工作,这就是引进吸收国外的传播学研究成果,调查研究中国当代的传播现状和发掘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中潜藏的传播理论。”^⑤而该丛书的三部专著均指向第三种努力,即“发掘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中潜藏的传播理论”,分别是郑学檬《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李国正《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和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

① 陈培爱:《记华夏传播研究的奠基人——余也鲁教授》,《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期,第19—28页。

② 之前的译本为[美]W.宣伟伯:《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余也鲁译述,香港,海天书楼,1983年版。这里引自[美]W.宣伟伯:《新订本序》,载[美]W.宣伟伯:《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余也鲁译述,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③ 孙旭培:《行进在华夏传播研究的路上——记我与余也鲁教授的相识相交》,《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期,第9—13页。

④ 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1页。

⑤ 郑学檬:《〈华夏传播研究丛书〉总序》,郑学檬:《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传播》。当然，面向历史也有当下关切，如赵晶晶（J.Z. 爱门森）编译的《“和实生物”——当前国际论坛中的华夏传播理念》（2010），汇集海峡两岸暨香港及海外众多学者的成果，重点论述了“和”“气”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观念及其现代价值。^①

自从第一部华夏传播研究专著《无形的网络》（1988）出版以来，有没有华夏传播理论的进展？恰如汪琪等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华人传播理论有没有可能？^② 陈国明曾这样回答：“归纳或演绎出普世性的传播理论，并不是不可能之事。”^③

二、从传播结构看中国历史：逐渐清晰的“无形的网络”

吴予敏《无形的网络》（1988）被称为“第一本华夏传播研究专著”。^④ 陈力丹曾盛赞：“这本书的研究是开创性的，正是它启发我注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传播结构在孔子那里的雏形。”^⑤ 陈力丹之所以能受此启发、注意到新的内容，或许是由于该书所体现的问题意识和观察视角，例如“使用口语交流的人将被置于什么样的传播语境里，而他又如何影响着这个语境”的问题意识，^⑥ 以及问题意识和观察视角背后的“想象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好的问题意识就规定了好的观察视角，也决定了能观察到何种结果，但好的问题往往需要具备“想象力”。黄旦认为，将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运用在历史研究中，就需要理解“结构意义”，对“个人与时代、事件与意义、史料与史”展开想象与勾连。^⑦ 正如米尔斯所说，“人们只有将个人的

① [美] 赵晶晶（J.Z. 爱门森）编译：《“和实生物”——当前国际论坛中的华夏传播理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0期，第1—15页。

③ 陈国明主编：《中华传播理论与原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前言第1页。

④ 黄星民：《华夏传播研究刍议》，《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⑤ 陈力丹：《论孔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第2—9页。

⑥ 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7页。

⑦ 黄旦：《历史学的想象力：在事与叙之间》，《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第15—19页。

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理解它们”,^①“我们在各式各样具体情境中的体验,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迁(structural changes)所导致的”。^②《无形的网络》恰恰有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的神韵,采取“生命、社会、历史”的观察视角。^③具体来说,该书在“社会组织与传播行为”、“官制演变与信息传达”“社会舆论和社会控制”的论证上,体现了很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由于《无形的网络》采取结构的视角,因而对儒、道、法、墨等各家传播观念的论述不多,不过依然试图在历史脉络与社会结构中把握他们的思想。

《无形的网络》最大的理论贡献,或许是其提出的六种传播结构,分别指向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三种现实传播结构是:同心圆型的“生命(生活)-传播结构”、枝杆型的“社会-传播结构”、偏心圆型的“历史-传播结构”。^④同心圆型结构类似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偏心圆型结构则能解释传统文化遗产和经验传承活动。枝杆型传播结构有助于理解这样的传播活动,即传统中国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器的内部信息沟通,更注重上下纵向沟通,但横向交流则时常处于被防范、监视、堵塞的境地。^⑤三种理想传播结构是:并列式的“生活-传播结构”、网络型的“社会-传播结构”和链式的“历史-传播结构”。并列式结构不再是从中心往外推,而是既彼此独立又彼此交叉,链式结构与偏心圆结构有根本区别,前者“以创新为目的实现了对遗产的片面的继承”。^⑥吴予敏提出,要突破枝杆型结构,就需要有一个既有上下垂直沟通、更有横向水平沟通、可以相互“制衡”的网络型传播结构。当然,“在理想图式、抽象图式 and 实际运行图式三者之间,常常是有距离的。”^⑦这个理想图式

①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② [美]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页。

③ 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09页。

④ 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10页。

⑤ 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11—212页。

⑥ 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22页。

⑦ 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15—219页。

既有“通天下之志”（《周易·系辞上》）的古风，亦有现代价值。

吴予敏实际上是用传播结构来观察中国文化，这种支配个体生活却又难以捉摸的传播结构，就如同“无形的网络”。在《无形的网络》出版近三十年之后，吴予敏坦言当时只是想把传播作为一种方法来认识中国文化^①，这种方法其实就是作为视角的传播结构。然而，结构视角并非早期华夏传播研究的主流，更多的研究采用功能视角。这两种视角可追溯到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1948）。拉氏“5W”模式是典型的功能视角，^②但他也关注宏观信息环境和受众注意结构，又能看出其结构视角。^③余也鲁先生也认为应该两种视角并重，既研究“传通的过程与作用”（功能），也研究“传通的结构与制度”（结构）。^④但正如“5W”的功能模式更容易被人记住一样，早期华夏传播研究也是“功能”压倒“结构”。功能视角是典型的美国经验学派特色，用吴予敏的话说，它追求的是“中层理论”或“小理论”，“从具体的传播经验现象出发，经过形式化的抽象提炼，形成概念化的公式”，目的是“从中总结出新的理论和规律，充实由西方人已经建构的传播学体系”，共同面对信息时代的挑战。^⑤相比美国的经验学派，欧洲批判学派更注重结构，吴予敏早年就受到后者的影响。《从零开始》（1994）收录了吴予敏的论文《从“礼治”到“法治”：传的观念》一文，援引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中“情境界定”的概念，即社会文化母体之中存在的“符号—意义”结构，儒家的礼就类似于这一结构。^⑥但余也鲁先生并不同意此举，他对吴予敏说“我们和他们是不

① 观点源自2017年11月18日吴予敏在厦门大学举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会年会”上的大会主题发言。

② 胡翼青：《超越功能主义意识形态：再论传播社会功能研究》，载[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108页。

③ 刘海龙：《一篇存在争议的传播学奠基文献》，载[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8页。

④ 参见余也鲁：《论探索——回到历史，回到中国》，余也鲁，郑学檬主编：《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⑤ 吴予敏：《从“零”到一：中国传播思想史书写的回顾和展望》，《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期。

⑥ 吴予敏：《从“礼治”到“法治”：传的观念》，载余也鲁，郑学檬主编：《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1页。

一样的，一般不引述他们的观点”，“他们”即指欧洲的批判学派。^①

然而，如果脱离社会结构来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是很成问题的。例如苏秦、张仪的说服之术离不开战国战争的社会大结构；从传播技巧的角度谈臣对君的劝谏，也离不开权力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李金铨（2003）就说：“脱离整个时代背景和生活语境，终归是非历史的，片面的。”^②也正因为个人在结构面前既有主体性亦有“不得已”，因而思想上的“一以贯之”就在现实中就显示出极大的张力。崔炼农在《孔子思想的传播学诠释》（2008）中就说，他试图“从零散的孔子言论中发现其‘一以贯之’的逻辑线索，重新建构孔子的思想体系”，“把孔子放回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知人而论事”，结果却遇到了“颠覆性资料”，最终放弃了部分章节的写作。^③

从《从零开始》（1994）到《华夏传播论》（1997）再到《华夏传播研究丛书》（2001），或许由于其重功能轻结构的路径，致使其承载了太多的批评，如“牵强附会”“用古代材料为今人的概念加注解”“将中国传统经验塞进了西方理论的模子里”等。^④笔者以为，后来者在反省之余却不必苛责前人，因为那只是囿于时代的“不能”而非“不为”。当年的华夏传播研究者无论是在史学功底还是文献研读能力上都具备高水准，只是当时传播学传入中国不久，研究刚刚起步，华夏传播研究者既无法超越整个“诠释社群”的水平，又要面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或“西方理论的本土化”这样的艰深命题，当然困难重重。对今天的华夏传播研究者来说，超越前人是“应有之义”，因为我们占尽天时地利，“既坐拥群书之利”，又有“期刊网搜索、阅读论文之便”，^⑤更有海外交流机会与英文研读能力。一言以蔽之，正是当年的研究者甘做“人梯”和“靶子”，才能有我们今天的“学术渐进”。

不过，结构视角研究近年来有回归的趋势，至少是结构视角下的功能研

① 吴予敏：《从“零”到一：中国传播思想史书写的回顾和展望》，《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期。

② 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2003年第77期，第1—21页。

③ 崔炼农：《孔子思想的传播学诠释》，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④ 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2003年第77期，第1—21页；吴予敏：《中国传播观念史研究的进路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3期，第33—39页；刘海龙：《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两个维度》，《现代传播》，2011年第9期，第43—48页。

⑤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